

台湾地区农村再生政策的实践探讨 ——以宜兰县三星乡为例

李季芳 苏诗岚*

摘要：2021年是大陆地区乡村振兴起始元年，国务院台办3月公布实施的《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农林22条”措施），此政策的落实会将两岸农业交流推向一个新阶段，加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转型；资源引导、优势互补、人才交融会是未来两岸农业交流新趋势。本研究以台湾地区宜兰县三星乡为例，将台湾地区最具经典的乡村振兴成功案例进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研究、梳理与分析，提供作为未来两岸乡村振兴与农村再生的案例参考。三星乡位处台湾岛东北偏乡、水患不断的地方，人口老化、年龄超过65岁以上者占20%，没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然而，近一、二十年来，三星乡所生产的葱、蒜打响了三星乡的名声，也为人民带来金钱的收入，改善经济生活。本文旨在分析探讨台湾地区农村再生政策，三星乡以地方农特产、产业经营的特色、如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建构台湾地区农产品“葱”的第一品牌，以农特产业打响地方知名度，进而顺利发展观光产业。

关键词：台湾；农业政策；乡村振兴；农村再生

中图分类号：F3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1)03-0092-08

DOI:10.13818/j.cnki.twyj.2021.03.010

2010年台湾当局推出“农村再生条例”，并编列建设经费1500亿新台币（约357亿人民币），专门为农村社区制定的政策，以“由下而上”、“计划导向”、“小区自主”、“软硬兼施”的指导原则，透过政策辅导小区居民能够独当一面，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农村再生计划。经由“培根课程”，积聚小区共识，自主研拟农村再生计划，打造自己家园及创造农村再生契机。^[1]本研究以宜兰县三星乡为田野调查观察对象，发现农村自主性地由下而上，台湾当局将农村居民视为农村共建的伙伴，鼓励主动参与，由地方组织单位安排与协调，整合小区内部与外部组织资源，发展合作社与协会组织，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农村，从个别农民转型为合作社组织，以共同营销的方式推广农产品，顺利发展观光产业。

三星乡的农村地方文化产业经历不同时期与阶段的政府辅导计划、政策支持与综合农业科技改良；在农村再生政策下完成农村再生培根训练计划，进行内部社区共识凝聚。目前已将当地的“葱满胜蒜”农业文化品牌形象，建构成为台湾地区农产品“葱”的第一品牌；在大众消费市场上，也形成了“高质量、高单价”的产品形象。三星乡的青葱销售平均单价表现，以三星地区农会共同运销平均单价表现，每公斤达到约人民币22元，较台湾地区一般葱价的2倍到3倍的高价格。^[2]经历近20年农业推广的积累与发展，三星乡农村地方文化产业直至今日才具备稳定发展的基础。然而，回顾台湾地区的农业环境与农村发展，近20年来却是问题与挑战接二连三的出现，面临全球农村地区人口危机、青壮人口

* 作者简介：李季芳，女，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博士；苏诗岚，女，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何香凝艺术设计学特聘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

外流^[3]、人口老化^[4]，农民因产业专业知识与能力有限，只能做到较粗糙的规划与农产品推广，导致农村的经济发展疲弱与恶化等社会现象。

一、台湾地区农村面临的困境、问题及解决规划

自从2002年加入WTO后，因农业贸易自由化，台湾地区农业产业遭受内外环境变迁与冲击，农村的农业结构转型与农业就业人口为706000人，占该年总就业人数的7.5%，2012年台湾农业总就业人口数降为约544000人，占同年总就业人口数之5.0%，其中65岁以上人数占17.1%，相较于2002年时10.7%明显增加，^[5]粮食自给率下降，农村青壮人口外流、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产生，加上长期以来“政府”建设都市与农村的预算分配不均，加速扩大城乡差距，造成工作所得的差异、就业机会与失业问题、农村经济发展疲弱与恶化等社会现象。^[6]

（一）农村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综合台湾地区乡村社区问题可归纳为几个面向：在环境面向，常出现自然生态保育概念缺乏、休闲资源过度开发、农村建筑与景色缺乏特色、在地原生物种的流失与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社区意识低落及志愿者人力缺乏、缺乏文化与活动设计的人才^[7]、农业生产技术的待提升及缺乏机具广泛使用、农药化学肥料的泛滥使用、农业救灾体系欠健全等问题；在乡村产业的面向，问题如农产品价格不稳定、工资上涨与人才不足、农户老年结构化、耕地面积小且生产报酬低等产业内外部的的问题；^[8]当地农民与居民问题面向，包括中壮人口外移、乡村传统文化流失与传统人文价值消逝、农村机能日渐萎缩衰退、传统农村以人为主的互助形式逐渐消失、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变质。^[9]

为了振兴乡村经济、缩小都市与农村人民的贫富差距，台湾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阶段性的政策，推动乡村改造与农村再生计划。多数的农业行政命令与办法推动，都依“农业发展条例”，此为农业政策的最高层次法源依据，但在实际执行计划时，往往面临农业计划与其他法规抵触，发生法律竞合与冲突，最后终告失败。例如，“农委会”1997年推动的“农村计划法”、2003年“农村建设法”等。经产官学研讨改进乡村振兴策略之后，基于乡村永续发展的视角而言，振兴计划除农村基础建设辅助之外，亦需从农村的“在地文化”、“自然保护”、“生态保育”、“环境多样化”、“社区人力资源活化”等面向，进行政策制定与推动，以提升农村的经济活力与能动性，并从社区、产业与农户三个层次进行发展。^[10]

（二）农村问题的规划解决

1970-1980年代台湾地区经济起飞、工商业发达，故农村人口严重外流至都市就业，留守乡村的多是高龄或老龄劳动人口，加上农村各项硬件与公共设施不足，农村人文营造软件因“政府”较少预算投入，故农村生活及文化特色逐渐丧失；除了产业结构有效人力流失之外，农产品在地销售的市场行情与出口外销竞争力，又因加入WTO而受到巨大冲击，农村经济与社会条件面临严峻挑战。此外，2000年之前，农政单位帮扶农村发展政策，主要是针对农村基础建设进行补助规划与推动；然而，基础建设虽对农村发展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但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所面临的问题，无法为农村解决实际的困难点与痛点。因此，为了解决农村综合性的长期发展问题，农业主管机关结合专家学者与农村在地的组织团体，一起探讨解决农村问题，为农村困境提出解决方案及发展农村功能计划。

1、台湾地区乡村振兴政策。台湾地区乡村振兴政策以“农村永续发展”为核心价值，其概念主要是希望透过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个子系统健全运行，以支撑现在人们生存与生活的需要且无损及未来后代子孙追求本身需要之发展。亦即“农村的发展可透过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结构与生活、生产、

生态的三生概念,达到农村经济、环境与社会文化的持续发展。”^[11]因此,振兴农村政策从农村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等三个面向进行规划。2010年台湾当局推出“农村再生条例”,是一部专门为农村社区制定的法律,推动“农村再生计划,建立富丽新农村”,实施的核心方法为“由下而上、社区参与、政府辅导”的方式进行乡村振兴,除了生活、生产、生态等三个发展的基本向度外,又加入了社会文化向度,朝农村永续发展面向进行,以解决人口外流、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疲软,农村地方文化、生活特色景观风貌逐渐丧失,产生难以吸引消费者进入农村休闲观光等问题。三生政策(生产、生活、生态)推广的预期达到的效益是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及生活的空间,挖掘及保存在地的特色文化与景观、促进土地使用活化与吸引年轻人回乡定居就业等整体规划,整合农村产业、自然生态与生活环境,创造富丽农村,使农村能够永续发展^[12]。

2、推动农村文化再生。(1)农村再生政策目标。“农村文化再生条例”中,关于“农村文化及特色”主要的政策内容架构为“历史或特色建筑维护之奖励”、“闲置空间再利用”、“教育倡导”、“人力培育及农村文化再生倡导、辅导”、“建立在地组织运作奖励与评鉴”等面向。台湾地区农村发展与社区营造政策制定方向包括生产、生活、生态、社会与文化等综合型多元面向,政策的目标是改善生活、重振经济、迈向永续、凝聚在地居民与团体共同发展。自2012年至2015年间推动的第一期“农村再生计划”中的人力资源培训成果计有2206个社区、142423人。^[13]农村在地社区的培根课程包含社区地图制作、观摩研习、产业文化相关活化活动、环境改善雇工购料、导览解说训练等课程。因应在地社区需求,规划各种方式增进农村社区知能、培育厚植在地人才,经“培根计划”培训后,在地社区人才渐能自主思考地方整体发展的需要。(2)农村再生政策计划绩效监测指标。2016年至2019年“农村再生第二期实施计划”执行的原则与方式是在地居民“由下而上、计划导向、社区自治、软硬兼施”,而推动的顺序为“农村再生、先做培根,培根做好,根留农村”强化农村在地社区民众与组织共同参与建设,并透过公部门协助社区团体促进在地农村振兴。此计划以“农村社区”为核心制定工作目标,以达到“活力、健康、幸福”的农村。计划的目标绩效监测指标分为7项:①吸引青年留农或返农(人数/年),②创造就业机会(人数/年),③带动年度农业及农村休闲旅游(万人次/年),④增加农业及农村经济产值(亿元/年),⑤提升大专业农年所得(万元/年),⑥推动农村活化再生(累计社区数),⑦改善农村再生社区整体环境质量面积(公顷/年)。^[14](3)资源整合、由下而上。“农村再生第二期实施计划”执行的程序,是由农村再生社区透过在地居民自主报名后,进行“培根计划”(包括培训课程、观摩研习、小型计划补助),上过专业课程后再依当地农村需求提出符合在地的“农村再生计划”,提交“年度农村再生执行计划”,其内容包括整体环境改善及公共设施建设、产业活化、文化保存及活用与生态保育等区块模块。“由上而下”的模块区块是由农村再生社区依照执行部门计划进行规划农村社区,并与跨领域合作平台进行跨域合作示范计划(平台包括“水保局”、产业单位与相关领域主管部门),提出跨域合作示范计划并公开阅览、举办公听会,并取得审查与核定后,最后结合各部门资源投入。“政府”资源投入计划的项目分为公共设施建设、农村社区整体环境改善、产业活化、文化保存与活用、个别住宅整建等面向。^[15]

3、执行农村再生政策成效。台湾农村文化再生政策是台湾地区首度针对农村小区量身打造的政策,以“专法”有系统地推动农村发展,为台湾地区的农村发展法制化,从产业、文化、生态与实质建设,突破农村发展瓶颈,成为打造农村永续发展及活化再生的里程碑。不同的是,以往政策推行大多是“由上而下”,“政府”发动、人民执行,“农村再生政策”却是“由下而上”,以截然不同以往的方式驱动农村小区发展。^[16]在推动与执行过程中,农村小区借由培训计划自主提案,小区居民持续参与学习,凝聚小区居民的共识。2018年以台中市46个农村再生小区作为观察对象的报告,发现农业再生计划

下小区普遍常见的五大执行问题为“补助经费配额有限、自筹经费来源不足”、“人口老化、年轻人力未能回流”、“活动企划经验及计算机操作能力不足”、“居民生活忙碌、缺乏合作共识”、“资源分配不均”。^[17]另外以满意度调查发现：参与农村再生计划确实可提升小区居民对小区发展满意度，并于农村生活、生产、生态发展满意度上，皆有显著的处理效果。居住在农村再生小区中，即使未实际参与培根训练课程的小区居民，其小区发展满意度亦较高于非农村再生小区的居民，存在显著的外溢效果。^[18]认为农村再生计划落实于小区，可带动地方发展，并提升在地产业^[19]。小区事务推动须由民众共同参与，由居民主动参与活动及进行情感交流的涉入行为，显示居民涉入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计划推动。^[20]分析结果显示居民有感于农村再生计划在小区生活环境改善及生态保护训练之成果，而计划应着重产业设施及产销协助。^[21]

2010年投入1500亿新台币（约人民币357亿）的“农村再生基金”，至2016年台湾地区总共有4,232个农渔村小区、2,195个小区参与农村再生计划（超过台湾地区一半农村小区）。^[22]至2018年累计辅导75家优质农村企业，营业额累积新台币11.09亿元（约人民币2.61亿），促进企业投资累积达4.8亿新台币（约人民币1.13亿）元，提供就业500人次，青农留（返）乡人数289人次。^[23]但也有学者提出“农村再生条例”的实施加速农地的流失，促使台湾农业加速衰退，无异与昔日农地改革策略背道而驰，台湾农业发展的愿景已不复存在，台湾人民的生计也将顿失依据。所谓“农村再生”，不过是农村的都市化、农地的建地化、农村生产的活化，也是由休闲农村取代而已。^[24]另有报告指出：虽有跨域合作平台，但跨不同部门的相关部会、各层级的地方政府的整合机制有待完善，欠缺私部门的参与、合作，忽略执行、监督机制、透明化原则，如经费透明、公开的要求，使得参与农村小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崩坏成为小区长远发展的阻碍。^[25]另外有学者统整分析台湾地区51个小区，认为“小区内欠缺必要之软硬件资源”，及“小区三生（生活、生产、生态）发展失当”。^[26]

台湾农村文化再生政策实施至今，初期实施的重点过于重视步道、凉亭等硬件建设，忽略生产设施，加上1500亿新台币的预算庞大，长期被忽略的农村，容易受到庞大资源的吸引，形成经费分食或是过度动员的窘境，执行过程中缺乏“跨部会”的协调，计划执行后又须进行繁冗的核销程序。农村污水处理系统等基础建设仍然不足，废土倾倒、工厂违建与假农舍…等问题，大众运输工具也相当缺乏。为了解决目前农村人口老化问题，强化农村再生的“产业扎根、跨域整合、多元参与”，台湾地区于2019年开始推动地方创生，^[27]主要聚焦于解决人口的问题，显见是农村未来另一个重要的课题。

二、“农村再生计划”下的三星乡

三星乡位处台湾岛东北偏乡，水患不断，人口老化，总人口数21467人，年龄超过65岁以上者占20%，^[28]是宜兰县所有乡镇中老龄人口比例最高的乡村；面积为144.2238平方公里，乡内农业从业者占多数，没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资源。三星葱在青葱销售平均单价表现，每公斤达到每公斤新台币近120元（约人民币22元/每公斤），是台湾地区一般葱价的2倍到3倍的高价格。^[29]三星葱如何透过“农村再生计划”，在农业产业经济提升与农产品品牌知名度的成功建构，是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核心。

（一）三星乡“农村再生计划”执行实况

依据农村再生计划，农村小区为取得农村再生小区的资格，必须先参与四阶段，共92小时的“培根课程”，藉由计划中培根课程的训练课程，居民意识提高之后，让农民在学习凝聚小区共识，才能研提各项对农村小区有帮助的软硬件建设项目，避免少数人的意见主导小区之发展。依据小区需求提

出4-10年的愿景规划,建起具有小区特色、前景明确的长期发展计划,并在通过取得资格后,隔年就开始逐年执行再生计划。

1、执行农村再生培根计划。以三星乡行健小区为例,初步于2010年开设关怀班,并有16位培根学员结业。之后持续推动进阶班,结业之培根学员增加至45人。在2014、2015年各开设核心班与再生班,结业之培根学员各维持45人。^[30]

三星乡大义小区则是以申请培根计划补助约人民币6万元,聘请大学讲师指导30名居民,耗时一个月时间,用木头一钉一槌,制作一比一拟真的水牛和牛车,放在小区重要路口处,搭配森林铁道意象。

2、借由培训凝聚共识。三星乡行健小区的农村再生执行主体是宜兰县三星乡行健小区发展协会,但与小区其他长青会、环保义工队等密切合作。历经数十次的会议讨论与访谈,议题内容包含讨论撰写农村再生计划内容及人力安排、排定优先施作顺序、如何引导居民与小区其他组织参与、小区既有问题解决与小区未来发展方向整合等。渐渐累积小区居民间的资源,在小区居民与小区相关组织互动中提供意见与响应下,提出了协会小区发展愿景——“富丽农村乐活行健”,以功能来规划再生分区:例如,三处核心聚落生活区、一处生活学习区、一处行健有机文化园区、四处有机田园产销育成区、一处休闲产业发展区、二处生机生态区。第一年加强组织培育、小区动员与居民参与等软件之建构,第二~三年:从公共建筑开始着手,第四~五年:从公共建筑、聚落核心向外扩散,第六年:加强各点之展示教育与经营管理。^[31]宜兰县三星乡行健小区发展协会主要透过培根课程完成农村再生计划,在拟定农村再生计划过程中,同时关注组织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资源与连结。

3、地方领导人的内外协调。地区领导人将农村居民视为知识的伙伴,鼓励主动参与,安排与协调,整合小区与外部组织资源,发展合作社与协会组织,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农村,从个别农民转型为合作社组织。本研究深度访谈“宜兰县三星乡行健小区发展协会”与“保证责任宜兰县行健有机农产生产合作社”的成员,研究成果发现,不同于台湾地区一般产销班或农会,发现协会与合作社成员自主性高,由下而上“自己甘愿来做这件事”自发、愿意程度高,以共同营销的方式推广在地农产品,老农“希望年轻人归乡,只要从农务能赚到合理的利润,年轻人回乡就有希望”。“除了不愁温饱,也为自己的土地尽一分力”。以共同营销的方式推广农产品,顺利发展观光产业。

(二) 结合资源——推动农业产业

经本研究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发现,三星乡小区多结合宜兰县三星乡公所、宜兰县政府、花莲县农业改良场、三星乡农会、“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等外部组织的财务支持(“农村再生基金”)、非财务支持(如有机耕作技术辅导),集体推动三星乡农业产业。“三星葱”的农产品市场销售价格能高于一般葱的市场价二至四倍,主要由于多系统的农业组织的“横向与纵向”良好协作、各司其职,除了能将一级产业农业种植产品做到产业内质量顶尖之外,由“三星葱”农业品牌所带来的二级与三级产业链的建构与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观察:

1、首重质量,引进科技。三星乡“三星葱”,远近驰名,全乡总年产量超过5000吨以上,总销售金额约新台币2亿5000万(约人民币5880万)元以上,三星地方农会年运销量约占3000吨左右、每年拍卖金额都在新台币1亿元以上。^[32]三星乡近20余年打造核心产品“三星葱”,地区农会引进科技,推动农业创新计划,例如种植土壤必须是渗透性与排水性高的砂岩,并且农会引进科技农业的田间管理方法,进行农药检测与土壤控管服务,建立健康种苗机制。为了延长保鲜期,三星乡农会添购保鲜包装系统设备,有效调节出货、稳定供货质量与延长存放时间。此外,经深度访谈了解地方农会对于三星葱的供销渠道,除了传统的“农产品拍卖”之外,亦向高端酒店、日料店、高端饭店推广,进行

定期供货与预约交易的长期合作方式,以确保质量顶尖的“三星葱”价格维持居高不下的稳定市场行情。

2、运用地方节庆,营销农产。每年三星乡公所、农会与合作社,共同举办各种融合地方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譬如米香稻草文化节、青葱银柳节、葱油饼节活动等,结合地方特色农产品,提供游客、参加互动DIY教学课程,品尝最新研发的创意农特产品,从事农事体验等。2019年2月年节举办的“花海气球嘉年华”,现场有新研发三星有机茶制作而成的抹茶冰淇淋,大受游客好评,在2019年7月“有机米香节”中,乡公所免费提供用三星米研制的500份米冰淇淋,清爽顺口,“七夕情人节”活动中,更推出了最新研发的甘酒冰淇淋。2019年11月17日举办“第一届三星安农溪马拉松嘉年华”中,也带入了三星物产,透过运动赛事,借机营销,譬如:完赛礼是三星米、沿路补给站则提供樱桃鸭卤味等,其他还有“米香稻草文化节”、“三星银柳节”等等。^[3]所有的营销策划案紧扣环绕着地方农产与农业主题,面向台北市、新北市与基隆市外围都市人口进行农业休闲与观光旅游宣传,除了带动三星乡农产品的消费、农产加工伴手礼与文创商品销售之外,并带动地方住宿、景点门票与饮食小吃的多元收入,建构起三星乡一级、二级与三级产业链外,并逐年提升与稳固,亦带动青年返乡与扩大当地农产三级就业机会。

3、循序渐进发展观光。在宜兰县三星乡,由农特产业打响地方知名度之后,观光发展已是顺水推舟,景点以三星特有田园景观及交通条件进行规划,从“天长地久”、安农溪、五分仔火车旧铁道,无论是外县市游客从高速公路,或者县内游客走台七丙线、196线道路进到三星,都可以东西向进出、由内向外或由外向内到各产业景点参观旅游消费。循序渐进发展观光,景点规划布置做好深度与永续经营准备,培训导览解说人员,建立人力资源,促进产销就业结合的管道。

三、结语

在“农村再生政策”施行框架下,通过对乡村振兴比较经典的案例宜兰县三星乡的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分析,台湾地区以“农村再生政策”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依据,透过自主性地由下而上途径,初期的推动是透过农村再生计划中的“培根”训练计划,提供诱因作为申请的条件,借由训练上课,来集结农民、凝聚共识,规划愿景方向,当局将农村居民视为知识的伙伴,鼓励主动参与,安排与协调,整合小区与外部组织资源,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农村,从个别农民转型为合作社组织。不同于台湾地区一般产销班或农会,本研究发观“宜兰县三星乡行健小区发展协会”与“保证责任宜兰县行健有机农生产合作社”成员自主性高,主要是由于“培根计划”教育课程实施落实,让在地参与政策与实操的成员能获取专业知识,并能透过引导成员制定与当地符合的乡村正兴施政规划、协助解决村内政策推进过程中的矛盾及解决人才适用性等问题。因此,此案例能顺利并取得成功的“由下而上”推进政策落实,以共同营销的方式推广农产品,顺利发展观光产业。由此可以得知,“农村再生政策”理念的基本关键,是透过政策及教育等载体,引导农村居民由下而上的参与,并透过监测指标评鉴作为指导与修正的依据;小区居民参与后,就能对于“政府”政策有所理解,也因此加强对地方活动的参与及向心力。所以“台湾农村再生政策”基本上是先由外部资源“政府”与相关组织提供诱因来推动,后续再渐由小区自发性的推动,例如三星乡小区结合地区农会引进科技,添购保鲜包装系统设备,使三星乡的特色农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农村小区因此成为农村再生政策推动的指标象征。冀希此案例的田野调研与深度访谈分析亦可作为目前大陆地区“十四五规划”乡村振兴的农业政策执行参考,并作为“农林22条”措施的施行细则的规划内容方向,期待将两岸农业交流推向一个新阶段,加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转型,资源引导、优势互补、人才交融会是两岸农业交流未来的发展趋势。

注释：

- [1]简韦琪：《农村再生—推动农村再生》，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政与农情》，2013年第249期。
- [2]段蓬福：《三星地区青葱产业发展分享》，宜兰三星地区农会，2019年5月9日。
- [3]Aileen Stockdale. Migration: Pre-requisite for rural economic regener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ume 22. Issue 3. July 2006: P. 354.
- [4]Toivo Muilu. Needs for rural research in the northern Finland context. Volume 26. Issue 1. January 2010: P. 74
- [5]周妙芳、韩宝珠：《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影响及因应之经验》，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政与农情》，2013年第253期。
- [6]陈耀勋：《加入WTO后台湾农业之转型发展》，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政与农情》，2002年第125期。
- [7]李永展：《永续乡村营造之初探》，台湾《中华水土保持学报》，2005年第36卷第4期，第340页。
- [8]钱小凤等：《台湾生鲜农产品供销模式与新兴商机》，台湾《品牌、通路、国际贸易市场研究报告》，2005年，第15页。
- [9]周鹤树：《台湾农村地区的永续发展前景与评估》，台湾《环境与艺术学刊》，2010年第8期，第13页。
- [10]王俊豪等：《台湾农村振兴与乡村发展之研究》，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政与农情》，2003年第144期，第238页。
- [11]陈昭郎：《休闲农业在乡村持续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台湾《农业推广文汇》，2006年第51期，第276页。
- [12]庄翰华、赖秋华：《农村再生条例的永续发展向度研究》，台湾《农业推广文汇》，2011年第56辑，第63页。
- [13]《农村再生第二期(2016至2019年度)实施计划(核定本)》，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2015年12月，第17页。
- [14]《农村再生第二期(2016至2019年度)实施计划(核定本)》，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2015年12月，第13页。
- [15]《农村再生第三期(2020至2023年度)实施计划(核定本)》，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2019年5月，第7页。
- [16]《台湾地方经济发展及人口回流政策之挑战与因应》，台湾财团法人“中技社”，2019年专题报告，第16页。
- [17]李固远、蓝丽琪、方珍玲、王俊豪：《农村再生计划参与对农村小区发展满意度的影响》，农业调查研究特刊论文，台湾《调查研究—方法与应用》，2014年第32期，第11页。
- [18]吕诗婷、李固远、谢奇明、苏宜成、蔡必焜：《农村再生小区执行问题与小区能力之分析研究》，台湾《农林学报》，2018，66卷2期第100页。
- [19]庄翰华、赖秋华：《农村再生条例的永续发展向度研究》，台湾《农业推广文汇》，2011年第56辑，第64页。
- [20]刘健哲：《村民参与农村再生之研究》，台湾《乡村发展》，2014年第16期，第41页。
- [21]张瑜娟、林宝秀：《农村再生计划参与对农村小区生活质量之影响》，台湾《造园景观学报》，2019年23卷第4期，第50页。
- [22]施君翰等：《台湾农村再生小区参与历程及观光环境空间关联变迁分析》，台湾《休憩管理研究》，2016年第3卷第2期，第22页。
- [23]陈明贤、刘力嘉：《农村再生创新机 翻转地方新价值》，台湾《主计月刊》，2019年第761辑，第46页。
- [24]陈信雄：《农村再生条例与农业发展》，台湾《新世纪智库论坛》，2010年第51期，第100页。
- [25]颜爱静等：《探索二十一世纪环境规划新典范的行动研究：农地利用、农业环境公共财供应集体行动之研究——兼论OECD新乡村典范在台湾的适用性(I)》，2017年台湾“科技部”补助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期末报告，第18页。
- [26]谢政勋：《SWOT分析应用于小区发展经营策略之研究——以参与农村再生培根计划之小区为例》，台湾《台湾小区工作与小区研究学刊》，2016年第6卷第3期，第2页。
- [27]资料来源：台湾“农业委员会”《农村再生创造台湾农村的新价值》，<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6098>，2020-08-09。
- [28]数据来源：依据三星乡户政事务所统计至2019年9月止。
- [29]段蓬福：《三星地区青葱产业发展分享》，宜兰三星地区农会，2019年5月9日。
- [30]数据来源：宜兰县政府农业处，<https://agri.e-land.gov.tw/cp.aspx?n=A051A81412121623&s=F938ECD055623F14>，2020-08-16。
- [31]颜爱静等：《探索二十一世纪环境规划新典范的行动研究：农地利用、农业环境公共财供应集体行动之研究——兼论OECD新乡村典范在台湾的适用性(I)》，2017年台湾“科技部”补助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期末报告，第63页。

[32]数据来源：兰阳博物馆电子报“三星的节庆”，<http://enews.lym.gov.tw/content.asp?pid=31&k=129>，2020-8-15。

[33]资料来源：台湾“宜兰县三星乡公所观光旅游服务网”，<http://sanshingtrip.e-land.gov.tw/Default.asp?Page=60&Sno=45>，2020-08-16。

(责任编辑 葭言)

Case Study on the Successful Policy of Rural Regeneration in Sanxing Township of Yi-lan County in Taiwan

Li Jifang & Su Shilan

Abstract: The year 2021 is the first year of revitalizing rural areas in the mainland. The policy introduced by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March, “Several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in the mainland”, simply called, “the 22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rticles”, will propel cross-Strait exchanges in agriculture toward a new stage by accelerating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y. The new tendency of cross-Strait agri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future will involve resource guides,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talent blending.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 case of the rural Sanxing Township in Taiwan regarding revitalization and regeneration in rural areas by conducting field investigation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examining as well as organizing and analyzing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representative case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Sanxing Township, located in northeastern Taiwan, is a remote township with frequent floods. It has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20% of locals are over 65 years old. There is no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r resources. However, for the past one or two decades, Sanxing Township has become famous for its quality produce of scallions and garlic sprouts, which has brought in lots of money and improved local economy.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rural regeneration policy in Taiwan. With the local specialty produce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Sanxing Township promot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by building the No. 1 brand of produce in Taiwan, “scallions”, which increases its visibility and thus contributes to the prosperous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Taiwa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Regeneration; Rural community